没有骂湖师大/湖师附的意思，更没有骂诸位得利保送同学的意思。

制度的合理性不应该建立在他人的道德标准上。当违规获利的方式触手可及而又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期待违规者从不出现是不现实的。为什么题目可以是由其中一部分参赛者利益直接相关的指导老师命制的？为什么命题后还可以正常和他的学生接触？为什么甚至成绩申诉都可以由这些人单方面决定？事关三四百人二至四年的心血和一生的前途，竟能以如此草率而极度不负责任的方式交代，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限制和减少竞赛升学名额只会是整件事更糟。你以为那会使参与者减少，从而仅仅把名额留给那些真正感兴趣、有天赋的参赛者。然而是否确实感兴趣、有天赋往往是入圈后才能判别的命题，因而缩减的总参与者数导致的是尖端水平在统计意义下的滑坡。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的，更小的圈子只会让各种潜规则和交易更难暴露在阳光下。想象搞潜规则的是升学影响力更小得多的某作文竞赛，这整件事甚至不会出现在舆论场里。

我深知改变远比当键盘侠难。一方面，既当裁判又当参赛者的诸校不可能主动交出权力，以及与权力相伴随的每年20-50个top2名额。对于大多数全国卷省份的王牌中学，这通常意味着50-90% 的top2升学数和学校胜过那些只搞高考的“二流学校”的中招吸引力。改变不可能自发产生，较有期待的是来自更上层的行政压力，也许这次能明确实锤的事件是个不错的契机。另一方面，正如付云皓学长那篇著名长文所言，有足够水平的命题者和阅卷人是比高水平考生更稀缺得多的资源。如果另请人命题阅卷，由谁来保障试卷的质量和阅卷判准？如果命题人命题后与外界封闭，这反过来是对命题人的学生的不公平。但这不意味着改变的不可能，也不是不改变的借口。就从这次的物理实验来说，将整个考场全程录像并公开发布并不构成技术上的困难，对吗？

从许多种意义上说，我既是制度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我有足够的理由痛骂学军中学那个我甚至不知道名字的教练，和我一起骂的人里自然也有人想痛骂凭什么我身处的是强校武汉二中，学校有复交科的邀请营名额保底。岁月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残忍无情，我知道和我朝夕相处四年的同学里也有人被迫接受了更差得多的结局，因为一些完全没有道理的规则和判准，和其他一些更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不公开不透明的体制里没有人是受益者，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无穷重复的台阶里终结。既然改变总有一天要发生，为什么不能在此刻开始？